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 日本 近代国语批判

[日]小森阳一 著  
陈多友 译



RiBen  
JinDaiGuoYuPiPan

吉林人民出版社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日]小森阳一 著  
陈多友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 (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6-04400-X

I. 日… II. ①小… ②陈… III. 日语—语言史—研究—近代  
IV. H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783 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 07-2003-1256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小森阳一免费赠予,特此致谢

##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著 者: [日]小森阳一 译者:陈多友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张 迅 责任校对:孙也丁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400-X/B·165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小森阳一（1953—），日本著名文艺批评家，东京大学教授。已出版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著作十余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开始运用后殖民理论对日本近代化，特别是民族主义和天皇制进行反省批判。本书从现代国语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日本语”的生成逻辑，及其在日本帝国殖民过程中的越境旅行，和对被殖民地本土语言的压抑。是一本出色的文化批评著作。

不过，由于本书的日本文化视角，尽管作者具有强烈的反对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情绪，对日本的近代历史中出现的对东亚各国的文化殖民主义也持批判态度，但是，在文字的表述方式上，还是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地方，对东亚近代史的认识也和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比如，对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和其他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殖民政策的一些提法并不适当；对一些名称词汇的表述也不同于我们，等等。对此，我们需要的是说明的是，这些只代表作者小森阳一个人的主张，作为读者，应该进行辨别和持审慎的批评态度。

## 《话语行动译丛》编委会名单

顾 问：罗 钢 刘象愚  
主 编：汪民安 陈永国  
编委会：马海良 汪民安 陈永国  
          陈 越 赵京华 郭 军  
          曹雷雨

# 译者序：日本国语与日本的现代性——语言民族主义的谱系

德里达在分析卡夫卡小说《在法面前》的同名随笔时，揭示了作为“法”的一种制度化存在的文学与“法”本身在起源上的关联。（中译见雅克·德里达著《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在该篇随笔中德里达这样解释道：“法被授予绝对的权威，它一定是没有历史、没有起源或任何衍生体的。这大概就是法的法。……每一种法中隐而不见的东西，就有可能是法本身，它制定这些法的法，是这些法的法。这一疑问与求索是不可避免的，它导向了朝向法的位置与本源不可避免的旅程。”德里达揭示出，所有的“法”背后在其起源上都是暴力的，自然，语言作为一种“法”其背后的暴力性亦不例外。小森阳一在本书中的问题意识毋宁说恰好就表现在这里。换言之，在近代日语、在作为与近代民族国家（它本身便是一个“法”）相配套的“国语”确立过程中，究竟存在过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它是怎样演变的呢？还有，近代日语之“国语”的确立过程——用德里达的话语来说就是它的立法过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立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日语这一语言的“法”体系背后的神秘之法究竟是什么呢？等等。

在具体涉及对这本书的观感之前，笔者先就本书的作者作一介绍。小森阳一教授现任职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综合文化科语言情报专业，由于他出色的学术成就就被公认当今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批评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现当代思想及文学、社会批判等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就以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卓越创建开始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形成巨大影响，（具体可参考岛村辉《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现状及方法论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6月期）成为继前田爱之后日本“文本派”理论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本人未必喜欢“文本派”这样的图式化标签（因为对他本人来说，文学的方法论是一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决非形式主义的理论欲望所能尽述）。附带提及，他的日本文学研究理论，尤其是小说叙事理论，对中国乃至世界学界也都会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因为他一直强调日文作为“汉字假名混合文体”的事实，并致力于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将其理论化，且付诸自己的实际研究中。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多样性变化，加之他本人得天独厚的政治敏感性，致使他的批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面对近年来日本政治上所出现的保守倾向，作为一名富于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是日本批判性知识分子中最核心、也是最尖锐的一位批判家。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在小森阳一丰富的著述中并不能算作最重要的著作，也决不是其专业领域中代表性发言（事实上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后记中所言，他参考了日本许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因为其过盛的批判意识，本书常常令中国读者自然而然揣度起其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在现实中的投影（对于小森而言，语言的问题也许更多是

政治的问题)。无论如何,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将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甚为陌生的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的认识不能不说甚为片面。从内容上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去认识日本,而少有立足于文化的角度去剖析它;从时间上我们只习惯于从明治维新的断面去领略日本,而甚少从“前近代”的角度去梳理日本的传统(严绍盪先生等研究者的一系列工作可能是这方面的例外)。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出发,以一种东方主义的态度,将日本的近代以前的文化神秘化。这样做造成的结果自然是一种不全面的日本认识。本书的中译本也许多少能够弥补我们对日本认识方面的不足。此外,我们希望这个工作今后可以吸引更多有志者的参与。这除了可以加深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外,同时也与强化自身认识密切相连。毋宁说后者也非常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信本书会对我们理解日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如日本的民族主义)能提供一些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所描述的是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围绕中国形象问题所展开的思考。

围绕着语言,尤其是日语中的汉字问题,作者所表现出的态度构成了本书的一个主轴。从江户时代(1600-1867)开始,尽管汉字已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但对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它仍是一个无法消融的“他者”(子安宣邦语)。这种情况在明治维新(1867)以后更是如此,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是一条脱亚入欧的道路。加之,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政府遭到惨败,致使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更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期。本书从近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国语”角度,论及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确立的江户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思想界状况。

小森阳一对日语这一语言的“法”体系背后所隐藏着的神



秘力量，亦即“法”之“法”的追溯过程是历史性的。它先从江户时期，即发生言文一致运动（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白话文运动）之前的那个时期开始去追寻它的踪迹。在江户思想家本居宣长那里，声音被赋予最高的意义。它被描述成“古之天籁”、“皇国正音”。本居宣长对声音所做的神秘主义式描述，之所以得以产生，理所当然有赖于其无法证明性。因为所有国粹主义或民族主义都如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所言，无非是建立在一种想像的共同体上的，而神秘主义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只与想像相关，而无法在现实层面论证，现实中它是永远不可企及的。本居宣长对汉字的敌意，当然也与幕府政权将朱子学当做官方意识形态有关，然而他所采用的方式的确是以确立另外一种权力的形而上学为手段的。那便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首先，小森阳一在本书中所着眼的并不是本居宣长本人的思想，而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者如何试图通过对本居宣长的重新阐释，以达到服务于体制的政治意图。

尽管时代有异，语境不同，但是小森阳一的著述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贯穿其中的无非是在“假名—汉字”这一二元对立中确立其假名（声音）的特权性，也就是说，欲对付汉字这一“他者”，就必须制造出强大的声音。如果说声音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地支配着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自本居宣长以降日本知识分子对声音的幻想也是支配着近代许多日本语言学者的紧箍咒。在本居宣长那里，他建构了一个起源的神话：日本语言的起源是先皇的“御音”，而神话的记载只不过是将权力的声音一一印记下来。对声音的迷信，自然是为了排斥书写，这一书写不仅是次要的、非根源的，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外来的”、非我族类的。如果说本居宣长的语言思想中的他者是汉字的话，那么，对日本近代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而言，这个他者不仅是历史上的汉字和现

实中的中国，而且，这里还多了一层在近代日本帝国扩张政策中语言如何服务于侵略政策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语言殖民问题等）。与语言的血统论最相近的无疑是声音这一要素。因此，由始至终，声音在策略上一直为文化民族主义者所注重。

小森阳一著书中的主要部分就“汉字对声音（假名）”这一二元构造，在明治维新后日语确立过程中如何被彻底化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剖释。尤其涉及到了最为敏感的意识形态，即天皇性与语言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作为外国读者我们虽然对此学说难以置评，但是中文读者仍然会感到非常新鲜的。尤其是本书第二章至第四章，关于现代日语形成过程的具体描述尤为独特。例如，小森阳一论及以近代意义上的大众为对象的“演讲”问题。在他看来，正是“演讲”这一声音媒体催生了现代书面语言。诸如此类的考证颇有新意。不禁令人沉入德里达前述文脉中的深深遐思：新闻这一印刷媒体与演讲这一声音媒体的介入，无疑为近代日语的诞生立了“法”。那么，如此“立法”本身与当时的民族国家“立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现代国语这一立法背后的“法”与19世纪末期的怪物——大众的登场之间有何关联呢？还有，现代文学这一“立法”本身与这些媒体的“立法”又有何种关联呢？

作为中国读者，掩卷之余，我们可能不由得想到如下问题：经过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汉字改革运动洗礼而最终被确立的“国语”——白话文，它的文字表记与声音的关系又如何呢？汉字真正拥有一个充分的“内部”吗（或者说我们将它与某种“内部”的观念相联系过吗）？虽然语境迥异（比如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启蒙意识），但是，现代汉语与现代日语在其确立（立法）的过程中显然共时性地走过了一条相似（或者说截然相

反)的道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两者之间就不存在丝毫的接合点吗?我们在进化论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驱使下,不遗余力地排斥的“他者”之一,不正是在“文”与“白”的二元对立中作为“僵化”“落后”象征的、极富表意性的“文语”吗?虽然我们在此所涉及的问题远非提起一个设问或是匆匆下一个结论那么单纯的。不过,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汉字的魅力也许正在于其开放性。然而,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又不禁要问: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一直竭力捍卫的日文中的汉字,难道就是今天我们现代汉语中的汉字吗?我们今天的汉字还是以前的汉字吗?按照德里达有关“法”的思考,它们不是分属于不同的立法系统、不同的“起源”吗?也许这正是小森阳一此书给我们中文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些难题:“他者”的自我批判如何成为我们自身的自我批判。在此也应验了一句话:认识他者,是认识自己的一个必由之路。其实,这一问题又岂能二分呢?

顺便说明一下,此书原名“日本語の近代”。围绕其译法,译者一直颇费思量。几经求教于赵京华先生,始才定名为《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但,仍有未尽其蕴藏之感。不过,这似乎恰能体现小森阳一理论的张力。相信诸位方家能从题外探寻到更多的惊喜。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成书于2000年,我正式接触它则是2001年。当时是林少阳先生极力向我推荐,称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并撺掇我把它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可是开始动笔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虽然该书距今还谈不上年代久远,所述内容又贴近我的研究领域,但是,正如小森先生在此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归根结底这部著作采用的是一种近似“欧文直译体”的翻译文体。其句式表达,文脉架构,逻辑推理,修辞手法等都极富个性。尤其是其句式表达,不仅冗长枝蔓,而且

多歧义性与重构性。因此，难以得心应手地对之做归化性诠释翻译。之所以译作拒迟至今日方才与读者见面，个中的理由似乎就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小森先生。是他在我心生疑窦的时候，给了我长达一年时间的悉心教诲，使得我可以真正从“内部”去解读其理论氤氲。其次，要感谢林少阳先生。是他一直在给予我鼓励和无私的帮助，并鞭策着我一步步深入至这一领域。更要感谢赵京华先生。是他慷慨地伸出救援之手，为我排忧解难，出谋划策，并亲自审稿。如果没有他给予的真挚、有力的技术支撑，此书是难以如此顺利地付梓的。最后，要衷心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崔文辉编辑，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及固有名词做了有限的注释（脚注均为译者所加）。由于才力不逮，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大家前贤给予指正。

译者

2003年11月13日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 目 录

译者序 .....	1
一 发现“日语” .....	1
1. “言”与“书”之间 .....	1
2. “清朝考证学”与“国学”的方法 .....	16
二 近代民族国家与“日语” .....	29
1. 作为新型媒体的演说 .....	29
2. 演说与翻译 .....	38
3. 报纸与自由民权运动 .....	42
4. 日本旁听记录方法的出现 .....	53
三 天皇的“日语” .....	65
1. 作为文本的《军人诏敕》 .....	65
2. 从《军人诏敕》到《教育诏敕》 .....	70
3. “臣民”意识与殖民地 .....	87
四 言文一致的幻想 .....	102
1. “国字”改良问题 .....	102
2. 小说与“言文一致” .....	110

五 战争与“日语” .....	129
1. “国家”与“国语” .....	129
2. “国语”的凝聚力 .....	142
六 殖民地占领与近代日本文学的成立 .....	167
1. 台湾的殖民地化与“日语” .....	167
2. “文学”的“日语” .....	175
3. “叙述部分”与“台词”的分离 .....	191
七 “标准语”称霸 .....	213
1. 书写声音 .....	213
2. 普选与圆本 .....	226
3. 阶层化“日语” .....	238
4. 殖民地“日语” .....	251
八 战败后的反复 .....	276
1. “当用汉字”与“现代假名用法” .....	276
2. 战后“圆本热”与“国民文学论争” .....	292
作者后记 .....	310

# 一 发现“日语”

## 1. “言”与“书”之间

若是将所谓“国语”中的“日语”问题置于近代国民国家之后的时间轴上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在其起点上，“本居宣长”<sup>①</sup>这个专有名词俨然会像普通名词一样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或者说，在“近代日语”这一术语之语境中思考语言问题时，“本居宣长”这个专有名词仍然被频频唤起。

文艺批评家小林秀雄<sup>②</sup>便是如此。“我们被赋予语言，无异于被赋予肉体，两者为同一事实。恰如肉体属于人却又不尽人意一般。虽然我们监督着作为纯粹表现的言灵作用（古人认为任何语言中都潜藏着神灵，在古代日本人们普遍持有如此观念——译者），但是往往却反被其所操纵”。“降临于我们身上并确保该种语言之如此神秘性的神灵究竟为何物呢？本居宣长认为：为了解答这一问题，设定一个任何人都坚信不疑的、巨大的国语母体是必不可少的”。（《本居宣长补记》，新潮社，1982年）

言既至此，仿佛再无须赘言。但是对在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地使用数种语言的人来说，小林秀雄的上述论点不免让人

产生抵触感。不，与其说抵触感，毋宁说是被排斥的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强烈感受到的被排斥感源自于小林秀雄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这一字眼。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平素甚难想象到“被赋予语言”与“被赋予肉体”为“同一事实”，而且这种结论本身也不具备任何方法论意义的过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如此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种语言，不仅因使用语言的不同而令其对自己的“肉体”的把握方式有所不同——那不只是在对事物进行对象化认识的时候，而且还包括从身体内部通过感觉知觉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时候，其感知本身将完全有异。按此说法，至少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言，自己得了肩周炎这一事实是在我们知道了“肩凝り”这一日语单词之后。

诚然，“恰如肉体属于人却又不尽人意一般”这一事实的确是司空见惯，但却看不出有任何根据可以把它与语言问题相提并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烦躁、冲动之类的被语言所操纵的情形，但是，我们不仅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曾经有过“监督着身为纯粹表现的言灵作用”的体验，也丝毫不认为今后会有这种体验。

对笔者而言，小林秀雄所宣称的“语言表现中的这一神秘性”，丝毫不神秘，只不过是自言自明、理所当然的一个“现实”而已。笔者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是开始在大学教授所谓的“国文学”的时候。当时我开此门专业课刚刚一年多，初读此书，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甚至对本职业所持的脆弱的自信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要“设定一个任何人都坚信不疑的巨大的国语母体”的情结，这个问题本身对笔者来说已经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既已如此，“本居宣长”这一专有名词自然便成为本人近乎厌恶、反感的对象，对此人以



前我从来不想提及，也从未提及过。即便如此，论及“近代日语”这一课题的实质无非是为了叩问何为“任何人都坚信不疑的巨大的国语母体”？至此，无论笔者怎样希望回避，仍不得不涉及“本居宣长”这一名字。诚然，将“本居宣长”问题化本身将会触及明治维新<sup>③</sup>之后，作为“近代民主国家”的“大日本帝国”与其语言之间的关系中最为根本性的部分。

安丸良夫将与近代天皇制相关的基本观念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一、万世一系的皇统，也即是指天皇现人神以及通过其集中体现出的阶级秩序的绝对性及不变性；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理念；三、以天皇及日本国为手段的世界统治欲望；四、对“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立足于其前沿的天皇同时又是大众偶像型的政治领袖。安丸从“本居宣长”身上看出了隐藏在其内部的与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密切相关的一个转折点。

本居宣长拒绝了如下颇具“异国之理”色彩的言论：例如，天照大神<sup>④</sup>是统一日本国土的太祖，高天原为其帝都，等等。他干脆宣称：天照大神便是太阳本身，日本是天照大神诞生之地，所以如史载“万国之本源、太宗之国”，“天壤无穷之神”。这样一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存在本身便成了其证据。（《玉帛笥》）本居宣长的这种主张是将《古事记》《日本书纪》<sup>⑤</sup>中的神话故事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世界观，这与儒学的理性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本居宣长之所以能够原封不动地将神话转化为世界观，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独特的语言中心主义观念：“所谓意、事、言，皆是用于互相称谓之物，……即意、事皆以言相传，书之宗旨则为记述之言辞矣《〈古事记〉传一卷》。正因为这一点，其就古典文脉的文献学研究才得以成为现实，可以说他开辟了一条古典研究的新道路。此后其古典研究的文献学方法论与其自身的世界观巧妙地融为一体，这正是本居宣长的特点。他将神话原封不动地带进自己的世界观里，